

“唐诗选学”论纲

○ 李定广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上海 200234)

〔摘要〕本文提出“唐诗选学”的学术概念。“唐诗选学”属于“唐诗学”的一个分支。“唐诗选学”的立足点和重心在唐诗总集。唐诗总集编纂演变史大致呈现四个阶段性特征:唐五代时期为兴盛期,宋金元时期为相对低潮期,明代为复兴期,清代为集大成时期。“唐诗选学”一千年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线索是:由重晚唐到重盛唐再到以盛唐为主兼顾三唐。“唐诗选学”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主要表现在八个方面:择优与取类;强大的诗学批评功能;诗学理论价值和诗学文献价值;作为“点”背后的“面”;影响时代诗学风尚变迁;影响时代诗歌创作;传播与传承意义;借鉴和指导意义。

〔关键词〕唐诗选学;范畴;逻辑;意义

“唐诗”是中华民族最美好的记忆,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代表性载体,是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根据,同时也是全人类文化艺术的瑰宝。唐诗以其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崇高成就和特殊质性而被公认为“经典”,它有一千多年经久不衰的研究历史,其中历代对唐诗的选编,就是一门学问,选编、注释、圈点、评论等,一千

作者简介:李定广,1966年生,安徽合肥市肥东县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期《学术界》封面人物,2003年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2007年晋升教授。曾获得市级“优秀教师”荣誉称号。已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省部级社科基金项目多项。出版学术专著《唐诗总集纂要》(上下)(与陈伯海合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唐末五代乱世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罗隐集系年校笺》(上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罗隐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古典文学新视角》(汕头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多部,在重要学术刊物发表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数十篇。主要研究领域:魏晋唐宋文学、中国古代文论。兼任中央电视台大型系列传统文化节目《中国诗词大会》的学术总顾问、上海市古典文学学会理事等职。李定广的研究特色是理论阐释与文献考证二者兼顾,力避研究走向学术偏激。展现其学术专长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是晚唐五代文学研究。《唐末五代

多年来从未间断,其选本的数量和热度是其它任何朝代诗歌都难以望其项背的,因而有许多历史经验和理论规律须要总结。而且,当代以至未来,唐诗选本仍然呈几何级数的增长,因而需要以总结的历史经验和理论规律作为方法论的指引。有鉴于此,本文提出“唐诗选学”的学术概念应不为唐突^{〔1〕}。

一、“唐诗选学”何以成立

说到唐诗的“选学”,人们自然会联想到“文选学”。自隋唐之际曹宪提出“文选学”名目以来,《文选》逐渐以文学经典的面目成为唐代“显学”,清代更达到顶峰,虽经“五四”冲击,但当今又恢复兴盛局面。《文选》实即汉魏六朝文学之精华,而“唐诗”实即唐代文学之精华,唐诗无论在数量上、质量上、文学史地位上无疑都超越《文选》,而且从历代唐诗选本的丰富性(如选诗、注释、圈点、评论等)和经典性(如蘅塘退士所编《唐诗三百首》等),以及未来的发展前景上,也不是“文选学”所能比拟。既然“文选学”可以成立,“唐诗选学”当也可成立。这里主要是借用“文选学”之名而引出“唐诗选学”。其实“文选学”与“唐诗选学”有很大的质性差异,“文选学”的研究对象只是萧统所编《文选》,乃诗文合选而以文为主,属于专书研究,具有封闭性,而“唐诗选学”的研究对象是历代千差万别的唐诗选本,仅选诗歌而不涉及其它,各种选本在选目上是不固定的,具有开放性。从性质上说,与“唐诗选学”相应的不是“文选学”而是汉魏六朝诗选学,如《玉台新咏》《八代诗乘》之类选本之学,《文选》不过是其中“略其芜秽,集其清英”(萧统《文选序》)之一部而已。

或曰,既然仅五万多首的唐诗可有“选学”,那么二十五万首的宋诗,四十多万首的明诗,难以数计的清诗可否也应建立“选学”?如果仅从数量上来说,这确实是个问题,也许未来会有“宋诗选学”“元诗选学”“明诗选学”“清诗选学”。姑不论李梦阳所谓“唐后无诗”,鲁迅所谓“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只目前从学界到文化大众的主流认知上看,尤其是从唐宋元明清各朝选本的丰富性和经典性上看,唐诗选本显然是一枝独秀,有建立专门之学的基础,更有建立专门之学的必要性。各朝诗选中,只有宋诗选本数量(自宋至清近百种)仅次于

乱世文学研究》《罗隐集系年校笺》二书均获得学界高度评价。如在2014年10月10日于苏州举行的“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十七周年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董乃斌先生唯一高度评价的就是《罗隐集系年校笺》。其二是唐宋文学文献考证。《唐诗总集纂要》《罗隐年谱》代表此领域的前沿水平。《〈唐诗三百首〉中有宋诗吗——与莫砺锋先生商榷》一文,考证《唐诗三百首》中有无混入宋诗,在学界引起较大反响。李浩先生在其《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导论》一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中将该文列为新时期中国古典文学学术论争的两个代表案例之一。其三是从中国文学史中发现并提炼出规律性认识。这一点尤其学术原创意义。如《“文体三变说”:中国文学史的基本论述模式》《论中国文人的“巫山神女情结”》《论中国古代咏物诗的演进逻辑》,都是这方面具有学术原创性的论文。其四是唐宋诗词乐关系研究,亦有一系列创新性成果。此外,在唐宋诗词普及上也做出了卓越贡献。央视2016年热播的《中国诗词大会》,李定广是唯一一位从策划、命题、审题,到写作与审定台本、辅导主持人、录制、剪辑、终审八个环节全程参与的专家学者,是该节目学术上的操盘者和把关者。

唐诗选本,明人不喜宋诗,故选本罕见,至清康熙末年仍有“选唐诗者不下数十家,宋诗选本传者甚寡”^[2]之叹,不过有清一代的宋诗选本数量还是不少,但无论是作为唐诗选本的附庸而产生的宋诗选本(如明代的《石仓历代诗选》,清代的《五朝诗善鸣集》《五朝诗别裁集》等),还是在唐宋诗之争中标榜宋诗的所谓“宋诗派”选本,都是唐诗选本阴影下的产物。因此,作为专门之学,“唐诗选学”是“宋诗选学”“元诗选学”“明诗选学”“清诗选学”的基础,某种意义上可以包容之。

二、“唐诗选学”的学术范畴

“唐诗选学”的学术范畴可从其与“唐诗学”“唐诗别集”“唐诗总集”的关系来确定。

(一)“唐诗学”与“唐诗选学”

唐诗在其一千多年的流传过程中,一直是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一大热门。但“唐诗学”作为专门之学,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被提出来,与“文选学”“龙学”“词学”“红学”相比,得名最晚,然大有后来居上之势,近年来“唐诗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自20世纪80年代中叶开始,由陈伯海先生领衔的“唐诗学建设工程”,至今30余年从未中辍,历三代共30多位学者前后接力,最终完成8种专书,形成960多万字规模的“唐诗学书系”(8种专书分别为《唐诗书目总录》《唐诗总集纂要》《唐诗论评类编》《唐诗学文献集粹》《唐诗汇评》《唐诗学引论》《意象艺术与唐诗》《唐诗学史稿》)。该“书系”绝不是一套丛书,而是一个学科体系,由“目录学”经“史料学”以至初步的理论总结,三个环节一以贯之,形成这套书系的基本架构。该“书系”于2016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全套推出,标志着“唐诗学”的基础工程建设已初步完成,也标志着“唐诗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正式成立。“唐诗选学”就是建立在“唐诗学”的基础之上,属于“唐诗学”的一个分支。“唐诗学书系”中《唐诗总集纂要》和《唐诗汇评》两种就属于“唐诗选学”的内容,前者是对于“唐诗选学”历史资源的总结,后者是对于“唐诗选学”当代应用的实践,两者结合可以构成“唐诗选学”作为一门学问的基础。

(二)唐诗别集与“唐诗选学”

一般人的观念中“唐诗选学”应该就是研究像《河岳英灵集》《唐诗三百首》这样的选本,似乎与唐诗别集没啥关系,其实不然。唐人的别集(个人文集)大多是诗文合集,也有不少是专门的诗集,称为唐诗别集。唐诗别集中又分为全本和选本,这个选本自然是“唐诗选学”的研究对象。唐诗别集中的“选本”又有自选本与他选本之别,自选本是作者对自己满意的或有代表性的或为特定用途的(如行卷、温卷、纳省卷、献诗等)诗作的汇集,他选本是传播接受者视角中挑选的佳作汇集。自选本唐代许多诗人(尤其是中晚唐人)都曾亲手编过,他选本仅李、杜等少数大家名家才有,如明王寅编《李翰林诗选》,明张含编《李太白诗选》,宋刘辰翁编《刘须溪杜诗选》,元虞集编《杜工部七言律诗》等。自选本与他选本的择诗立场与标准差异很大,大部分唐人自编的诗集皆经过认真筛选,汰去若干应酬无

聊和不成熟之作,如罗隐晚年自编诗集名《甲乙集》仅收诗三百余首,去世后他人重编《甲乙集》收诗四百多首,又如杜牧晚年仅保留自己少量佳作,其它一概烧掉,以免后人汇集而影响清誉。可见唐代诗人自己更重视自选集(少数如白居易更重自己的全集),而后人在刊刻唐人别集时更重视全集,尤其重视“全集”的传世保存,而不太重视“选本”的传世保存,因此唐宋元明清五朝唐诗别集中的“选本”存世者不多,从某种意义上说,唐诗别集中的“选学”实际上主要限于少数大家名家,其在整个“唐诗选学”中所占比重较小,“唐诗选学”的重心还是在唐诗总集。

(三) 唐诗总集与“唐诗选学”

中国古代文集一般分为别集、总集两大类,别集则是一个人的作品集,总集是包含两人以上(含两人)作品的集子。总集和别集的编纂大致各有两个追求目标:求全与求善。这里以唐诗总集为例加以申说。据笔者估算,现存唐至清末之唐诗总集有四百余种(还不包括含有唐诗的通代总集以及后代对前代唐诗总集的重复笺注、评点本),求全者,以全集为代表,如《唐诗纪》《唐音统纂》《全唐诗》等;求善者,以选本为代表,如殷璠《河岳英灵集》、沈德潜《唐诗别裁集》、蘅塘退士《唐诗三百首》等;还有一种既求全又求善的,以合集为代表,如朱警《唐百家诗》、万虞恺《唐李杜诗集》、汪立名《唐四家诗》等。当然唐诗全集、唐诗合集、唐诗选集三类总集相互亦有交叉,其中以唐诗选本数量占绝大多数,且在三类中出现最早^[3],而以唐诗全集数量最少(十种左右),且在三类中出现最晚^[4]。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学界对唐诗别集的整理与研究较为充分,成果丰硕,但对唐诗总集的整理与研究却相对冷清,唐诗总集研究正是“唐诗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且与唐诗别集相比,唐诗总集更多地打上时代的烙印,更能反映各个时代的风尚。唐诗别集的编纂多数已由唐人完成,后世偶有重编重刻(钞)增补而已,故自唐至清,唐诗别集的编纂规模总体上呈现递减趋势,而唐诗总集则刚好相反,每个朝代、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反应时代风尚的唐诗总集。故而,与对唐诗别集的研究相比,对每个朝代、每个时期的唐诗总集的研究,尤具“唐诗学”的意义,也是“唐诗选学”的立足点和重心所在。

三、“唐诗选学”的发展逻辑

唐诗选本的编纂从唐代开始就形成热潮,其后的发展演变有一定的规律。到明清时期除了选本大规模增加外,又涌现一些合集和全集。其编纂规模总体上呈现递增趋势,但也有曲折,其编纂演变史大致呈现四个阶段性特征:唐五代时期为唐诗选本编纂的兴盛期^[5],宋金元时期为唐诗选本编纂的相对低潮期(三朝总共约百种,今存者三十余种),明代为唐诗选本编纂的复兴期,其唐诗选本的编纂规模大大超过唐宋金元四朝的总和,清代为唐诗选本编纂的集大成时期,其唐诗选本的编纂规模又超过唐宋金元明五朝的总和。清代的唐诗选本不只数量空前,质量(主要指学术水平)总体上也是超越前朝,其编纂类型、编纂旨趣、编纂

风格、编纂体制呈多元化的发展面貌。如明代唐诗选本大多重初盛唐尤其是盛唐,而清代唐诗选本则有重初盛、有重中晚,有只重初唐,有只重盛唐,有只重中唐,有只重晚唐,有初盛中晚并重,等等,不一而足。又如明代唐诗选本多重总体格调,从体裁、技法角度选诗不多,佳选更少,而清代除了重总体格调外,大量涌现从唐诗体裁、技法角度选诗评诗的选本,使得唐诗艺术的探索走向深入精微。

如果忽略枝节,总体上看“唐诗选学”一千年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线索,我们发现基本发展规律就是:由重晚唐到重盛唐再到以盛唐为主兼顾三唐。晚唐五代至宋金元,选本主流是重晚唐,元末杨士弘《唐音》至明末为重盛唐时期^[6],清代选本虽然多元,但主流仍以盛唐为主兼顾三唐,同时伴随着唐宋诗之争而产生许多唐宋诗合选本。三个阶段各有特色亦各有偏颇,其中清代的“以盛唐为主兼顾三唐”貌似比较公允,甚至影响至现当代,成为当代许多人信奉的标准或选唐诗的原则,实际上仍存在严重的缺憾,即以盛唐格调为准绳来去取中晚唐诗,从而失去了中晚唐诗应有的本色与精华。这一点,古典唐诗学的集大成者胡震亨早已看到了:

自宋以还,选唐诗者迨无定论。大抵宋失穿凿,元失猥杂,而其病总在略盛唐详晚唐。至杨伯谦氏始揭盛唐为主,得其要领。……高廷礼巧用杨法,别益己裁,分各体以统类,立九目以驭体,因其时以得其变,尽其变以收其详。斯则流委既复不紊,条理亦得全该,求大成于唐调。……而大谬在选中晚必绳以盛唐格调,概取其肤立仅似之篇,而晚宋人真正本色一无所收。^[7]

胡震亨批评的虽然是高棅的《唐诗品汇》,但对于清代唐诗选本乃至现当代的唐诗选本也同样合适,即使如清代最为著名、影响最大的两部唐诗选本《唐诗别裁集》和《唐诗三百首》亦未免此弊。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康熙、乾隆两朝是唐诗选本的编纂高潮期,古代“唐诗选学”的鼎盛期,选学宗趣多元纷呈。最突出的除了前述唐宋诗之争、宗盛唐宗晚唐之争外,就是宗李杜与宗王孟之争,近体七律选本和省试诗选本的编纂热潮。宗李杜虽仍是主流,但以王士禛《唐贤三昧集》、汪立名《唐四家诗》为代表的宗王孟选本一时间造成很大影响。继顺治年间顾有孝《唐诗英华》、金圣叹《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之后,康熙、乾隆间涌现赵臣瑗《山满楼笺注唐诗七言律》、毛奇龄《唐七律选》、胡以梅《唐诗贯珠》、毛张健《唐体肤论》《唐体余编》、张世炜《唐七律集》、翁方纲《七言律诗钞》等大批七律选本,这是前所未有的值得注意的选学现象,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康、乾时期选家已认识到七律代表了唐诗艺术的高度。至于省试诗选本的大量涌现,与康熙后期不断讨论恢复唐人以诗取士制度至乾隆时真正实施有关。

总体上看,三个发展时期的唐诗选本中最著名、影响最大的选本,唐五代时期是殷璠编《河岳英灵集》和韦毅编《才调集》,宋金元时期是元好问编《唐诗鼓吹》和杨士弘编《唐音》,明代是高棅编《唐诗品汇》和李攀龙编《唐诗选》,清代是

沈德潜编《唐诗别裁集》和蘅塘退士编《唐诗三百首》。其中又以《唐诗三百首》为唐诗选本之最,《千家诗》的影响虽仅次于《唐诗三百首》,但非纯粹的唐诗选本(唐宋诗合选)。

四、“唐诗选学”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在现存四百多种唐诗总集中,除了十种左右的唐诗全集外,皆是唐诗选本和唐诗合集,而唐诗合集也属于唐诗“选学”范畴,唐诗选本为选“诗”,唐诗合集为选“人”。所以,对唐诗总集的研究,某种意义上就是对唐诗“选学”的研究。唐诗总集研究的主要意义包括:目录学意义,文献辑佚意义,全面呈现历代唐诗传承概貌的意义,还有为掌握唐诗“选学”的特殊性能与发展状况提供基本资源。唐诗选本和合集最重要的“选学”意义可从如下几个方面观察:

第一,许多选本选录某一领域中优秀的作品供读者揣摩学习,便于人们认识作品的精美,是为“择优”,所谓“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8],而合集选择某几个诗人的诗集合刻,便于人们认识作家的共性,是为“取类”。尤其是那些著名的选本和合集,择优、取类的功能更加突出,从而使读者获得思想艺术上及诗学观念上的启发和帮助。如李攀龙《唐诗选》、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和蘅塘退士《唐诗三百首》几部选本历来是大家公认的择优的典范,而《二妙集》《二张集》《唐四杰集》《唐四家诗》《温李二家诗集》等是取类的典范。

第二,选本强大的诗学批评功能甚至超过诗文评类专书,通过选谁不选谁,选谁多选谁少等选政手段来推举和贬抑某些作家,标举某种风格流派。这种通过“选”达到文学批评的目的,即鲁迅所谓“选本可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9],且其达到的批评效果往往超过文学批评专著。方孝岳在《中国文学批评·导言》中说:“从势力影响上来讲,总集的势力又远在诗文评专书之上。”^[10]如《唐音审体》选唐人二百余家,选面可谓广矣,但选杜甫、李商隐、李白、白居易四家诗最多,推举此四家为唐诗大家的意图明显,又不仅不选许浑、韦庄、李中三家诗,还在自序中对三家极尽贬抑之能事。再如《唐诗三百首》选唐人七十七家,选面亦较宽,但选杜甫、李白、王维、李商隐四家诗最多,推举此四家为唐诗大家的意图亦明显,仅选白居易寥寥数首,不选李贺、皮日休、陆龟蒙、罗隐四名家诗,亦有不满这几家诗风的意味。又如《二妙集》标举贾岛、姚合的共性特征,“姚贾”作为一个诗派名称,即由此书而确立;而《寒瘦集》又标举孟郊、贾岛的共性,强调“郊岛”的流派倾向。当然,也要了解选家倾向带来的弊端,鲁迅所谓“读者的读选本,自以为是由此得了古人文笔的精华的,殊不知却被选者缩小了眼界”^[11]。

第三,大部分选本和合集,表明了编选者鲜明的、有价值的文学观念,尤其是其中的序跋小引和凡例(有的选本还有评语),具有很高的诗学理论价值和诗学文献价值,是古代诗学理论批评的重要研究对象和文献依据。最著名者如李存《唐人五言排律选》、杨士弘《唐音》、高棅《唐诗品汇》三书所标举的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唐说”,李攀龙在《唐诗选》自序中提出的“唐无五言古诗说”,黄周星

在《唐诗快》自序中提出著名的“唐诗四季说”，叶燮在《百家唐诗序》中提出著名的“中唐为百代之中说”等等，皆影响巨大而深远。

第四，对于深入研究某作家作品这个“点”来说，唐诗选本具有“面”的意义。要深入理解某一作家及其作品这个“点”，必须放在他所处时代文学的“面”中来考察，这样才能认识该作家作品的特色、价值、创造性及其继承发展情况。鲁迅先生说：“倘要看看文艺作品呢，则先看几种名家的选本，从中觉得谁的作品自己最爱看，然后再看这一个作者的专集，然后再从文学史上看看他在史上的位置。”^[12]譬如要深入理解大诗人李白诗歌的突出成就与价值（即“点”），就得将他与同时的一些诗人如杜甫、王昌龄、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以及其前后的初唐、中晚唐的诗人诗作（即“面”）进行比较，有比较才有鉴别，才有深入的认识。当然，唐诗全集（如《全唐诗》）是最佳的“面”，但全面阅读不容易做到，所以这种面上的对于众多唐代诗人作品的较为全面的认识，一般通过阅读大中型的唐诗选本（如《唐诗别裁集》）来解决，对于专家来说，至少是了解“面”的第一步也是必要的一步。而对于一般读者来说，中小型的唐诗选本（如《唐诗三百首》）即能解决问题了。

第五，唐诗选本和合集的“选学”意义更重要的体现在观察唐代作家作品、风格流派在各个时代的升降起伏与各个时代诗学风尚变迁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从各个时代诗学风尚变迁来观察唐代作家作品、风格流派在各个时代的升降起伏的规律，也可以反过来从唐代作家作品、风格流派在各个时代的升降起伏来观察各个时代诗学风尚的变迁与特性。如明代前中期多初盛唐合集，而晚明则多中晚唐合集，从中可见时代风气之转向。再如晚明诗学风尚从格调诗学转向性灵诗学，可从《唐诗归》得到具体的印证。又如从王士禛所编《唐贤三昧集》标举的“神韵说”，到沈德潜所编《唐诗别裁集》彰显的“格调说”，再到翁方纲所编《七言律诗钞》体现的“肌理说”，鲜明地反映出康、乾之间诗学风尚的变迁与特性。

第六，唐诗选本不止对各个时代诗学风尚变迁影响巨大，对各个时代文学创作的影响同样巨大，甚或超过名家别集。鲁迅先生认为：“评选的本子，影响于后来的文章的力量是不小的。恐怕还远在名家的专集之上，我想，这许是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人们也该留意的罢。”^[13]鲁迅先生这个观点很有价值，只可惜没有引起撰写《中国文学史》的学者们注意。所以，以后若要撰写真正科学严谨的《中国文学史》，唐以后部分必须纳入重要的唐诗选本与当时文学创作的关系这一部分内容。

第七，唐诗选本具有强大的传播与传承意义，并往往以此影响经典作家与经典作品的确立。其传播接受方面的意义鲁迅先生认为“比所选各家的全集或选家自己的文集更流行，更有作用”：“凡选本，往往能比所选各家的全集或选家自己的文集更流行，更有作用。册数不多，而包罗诸作，固然也是一种原因，但还在近则由选者的名位，远则凭古人之威灵，读者想从一个有名的选家，窥见许多有名作家的作品。所以自汉至梁的作家的文集，并残本也仅存十余家，《昭明太子

集》只剩一点辑本了，而《文选》却在的。读《古文辞类纂》者多，读《惜抱轩全集》的却少。凡是对于文术，自有主张的作家，他所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张的手，倒并不在作文心，文则，诗品，诗话，而在出选本。”^{〔14〕}优秀的唐诗选本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读物，对传承传统文化精华，参与历代文化建设，中国人文化素质的构成都有很大影响。

第八，许多唐诗选本有注释、评语，既有文献价值又有文学价值，对于当代和未来的唐诗选本编纂实践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注释中的训诂、考据有助于我们准确理解诗义，评语有助于我们领会诗意。当代和未来欲编纂更高质量的唐诗选本，不可能不利用这些累积的资源宝藏。

当然，唐诗“选学”的理论意义远不止以上诸点，这里仅撮其要而已。而唐诗“选学”的理论意义本身就具有实践的品格，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产物，因而其作为理论资源比其它理论更具备指导实践的意义。

注释：

〔1〕胡光波有《二十世纪唐诗选学概论》一文，见载《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其所谓“唐诗选学”是普通操作性用语，与本文的学术性概念不同。

〔2〕〔清〕王史鉴：《宋诗类选·例言》，康熙五十一年乐古斋刻本。

〔3〕愚见，出现最早的唐诗选本应是初唐许敬宗编《翰林学士集》。

〔4〕愚见，出现最早的唐诗全集应为宋末赵孟奎编《分门纂类唐歌诗》。

〔5〕据陈尚君《唐人编选诗歌总集叙录》所考有一百三十七种，今存者尚有二十种。

〔6〕明末虽有重视中晚唐的言论，但选本实践中罕有反映。

〔7〕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三十一《集录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326页。

〔8〕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总集类》，中华书局，1965年，第1685页。

〔9〕〔11〕〔13〕〔14〕鲁迅：《鲁迅全集》第七卷《集外集·选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38、139、139、138页。

〔10〕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第4—5页。

〔12〕鲁迅：《鲁迅全集》第三卷《而已集·读书杂谈》，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429页。

〔责任编辑：李本红〕